



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沈澄梁
封面装帧 许明耀

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常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0,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书号 7074·282 定价 0.43 元

目 录

- “她是我们的女中豪杰” 陈 敏(1)
——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章蕴
- 为真理而斗争 冒天启(9)
——记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
- 将军的夫人 张 贵 李月柱(21)
——记优秀共产党员胡静
- 沂蒙赤子 周福禧 饶洪桥 董祥起(29)
——记离休干部周禄
- 维护党风的坚强战士 原廷玉 范 漂(33)
——记山西运城地区纪委副书记张戈
- 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 金树华(38)
——记天津电磁线厂梁万和
- 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人 曹云华等(42)
——记河北省劳动模范田益兰
- 乐为人民扫马路 登 林(50)
——记全国城市环境卫生劳动模范徐素珍
- 默默地把温暖送给别人 王子厚 姬铁聚 王超群(59)
——记河南省劳动模范阎淑芳
- 雷锋式的好工人吕继华 朱志龙 徐家传 吴福田(66)

- 一心为群众谋福利的好干部 王存方 刘华礼(75)
——记吉林省农安县前岗公社党委书记刘福忠
- 当代愚公——杨皂 郑合生 彭启炎 李景宏(82)
大山的女儿 沈 纯 严志泉 陈廷鑫(90)
——记扎根彝族山区的成都市知识青年巫方安
- 人民医生周礼荣 王 虹 刘葵华 陈朝中(95)
为国争光报党恩 卞 琴 于 村(106)
——记大气动力学家曾庆存
- 她心中的目标 吴文贾(116)
- 记广西轻工业研究所工程师雷爱社
- 党的好女儿 贵 琦等(122)
——记一二七医院副院长唐祖贵
- 一片赤诚为学生 范庆涛(128)
- 记上海江宁路小学教师顾家宁
- 献青春塞外 图中华昌荣 梁桧人等(136)
——记北京部队优秀指导员李建民
- 一个幸存者的追求 邱为民等(149)
——记海军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干部卜凤刚

“她是我们的女中豪杰”

——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章蕴

陈 敏

经过党的十二大充分酝酿、讨论，我们党的一个新机构——顾问委员会产生了，一百七十二位老革命家当选为顾问委员。他们都是革命的功臣，民族的精英呵！有这样许多久经考验、身经百战，为共产主义奋斗几十年的老同志作党的顾问、人民的参谋，这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大家多么想多了解一些他们的事迹，从他们身上汲取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她就象一团火

记者怀着这样的心情，曾经走访十二大的一些代表。新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同志告诉记者：“应该写写章蕴大姐。她是我们的女中豪杰，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早在抗战期间，我在苏中区党委任书记时，她是苏中二地委书记。从组织上说，是我领导她，而从思想上说，是她帮助我。她的那颗心，从青年时代起，就倾注到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人民谋利益上。”

那是第一次国内大革命的风暴将要来临的前夕，一个二

十来岁，短发、大眼睛，有很重湖南乡音的姑娘，为了追求妇女的解放和革命真理，来到军阀吴佩孚统治着的汉口，她就是章蕴。几经周折，她终于找到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告诉她要广泛开展革命宣传，迎接当时由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派她去担任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妇女部长。那时汉口一片白色恐怖；军阀的“执法队”提着大刀，满街巡行，发现可疑的革命者，立即“就地正法”。一天早晨，她和宣传部长陈定一同志吃过早饭，一起出门分头去工作，等她傍晚回来时，就看到陈定一同志的头颅已被装在篾笼里，挂在武昌火巷口的电灯柱子上。军阀的残酷屠杀吓不倒勇敢的姑娘，章蕴和同志们加倍努力工作，终于在一九二六年九月配合北伐军光复了汉口。胜利的形势使章蕴更加废寝忘食地投入了战斗。那时共产党员少，工作十分繁重，生活清苦，但大家总是兴高采烈。她与担任工运书记的李耘生同志结了婚。但是不久，蒋介石与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武汉重新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一九二八年，党派李耘生和章蕴到南京开展秘密工作。李耘生担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章蕴负责机关和联络工作。一九三二年，由于叛徒告密，李耘生的一个十五岁的妹妹和她的二岁半的儿子被抓走了。当时章蕴正怀孕即将分娩，组织上决定她转移到湖南老家。李耘生还坚持在南京处理善后，不久也不幸被捕，于同年六月八日牺牲在雨花台。噩耗传来，章蕴正要临产，又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巨大的悲痛和残酷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地考验着当时才二十七岁的章蕴。她擦干了眼泪，下定了决心：一、不当国民党的顺民，二、要继承烈士遗志加倍工作，三、终

身不改嫁，挑起革命和抚养子女的双担。她分娩后，就带着孩子到长沙，一面做工，一面寻找党的关系。不久，在湘潭地区出现了一位工作十分活跃的地下党中心县委书记，她就是章蕴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了，红军长征后留下来坚持打游击的八省健儿，汇集在一起组成了新四军，党派章蕴去新四军，并在党的东南局妇委工作。她不畏艰险，几次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往返于大江南北。她或是到群众中去发动“二五减租”；或是在油灯下熬夜起草文件；或是担任征粮指挥；或是到烽火连天的前线。一次，日伪军要进攻我们在苏中的一个重要城镇——黄桥，当一些同志还在犹豫时，她指挥大家坚决将粮食转移，并定下一条规定：“不听到步枪声不跑”。当胜利完成转移任务时，她的两腿已肿得象圆筒了。陈丕显同志说：“章大姐象一团火，干起事来干劲足得不得了，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事，她总是奋不顾身地干。”

“革命精神是永远不能退的！”

全国解放初期，章蕴曾任中央华东局妇委书记、华东妇联主任，并兼上海市委妇委书记和市妇联主任；一九五二年以后，调任党中央妇委第三书记兼全国妇联秘书长，后来又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直至“文化大革命”。她在妇女工作战线上十多年，真可算是一位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妇女群众服务的忠诚战士。

象这样一位对党赤胆忠心的老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污蔑是“叛徒”，甚至无耻地诬陷她“出卖了李耘生”。章

蕴的儿子李晓林说：“与其说妈妈‘出卖’，不如说是我‘出卖’的”。他沉痛地追叙起往事：一九三二年，敌人把他和他的小姑从家里抓走时，他才二岁半，后来敌人抓到了李耘生，但无法确认，就把小孩带去见李耘生。孩子太小了，一见到李耘生，就抱住李耘生的腿大喊爸爸。李耘生见已无法隐瞒，就抱起孩子亲了亲，在这以后不久就英勇就义了！

十年内乱，章蕴饱受折磨和摧残，后来被送到河北衡水劳动。让她筛煤，她把煤筛得好好的；让她养鸡，她就把鸡养得肥肥的。她说：“煤是大家要用的，养鸡给大家吃也是好事，只要能为党为国家创造那怕是点滴财富，都对自己是一个安慰。”

粉碎“四人帮”后，章蕴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又忘我地投入了工作。党让她做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她就日日夜夜地忙碌，有时一个星期天有十几批人等着要谈话。阿姨怕把她累垮了，想让她休息一下，她却立下一条规矩：不让挡。有时甚至已经上了床，一听到有人来，又起来谈话。为了弄清案情，有时还亲自去监狱调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章蕴担任了副书记，就更忙了。她经手办过不少大案，曾多次不辞辛劳，北上黑龙江，南下福建，东去浙江、上海，西到新疆，亲自调查了解案情，与地方党委商议作出决定，每个案子都办得干净利落，又扎扎实实。新疆一位八十多岁老同志的旧案，拖了多年未作结论。她接手处理后，亲自同有关的主要领导同志碰头商量，仅用一个星期时间就完满地解决了。一年春天，她去黑龙江处理于天章诈骗案期间，她的食道裂孔疝病发作了，痛得不能吃饭。医生见她这么大年纪不能动手术，要她快回北京。

她却一直在那里坚持了四十多天，直到把案件处理结束后才回北京。

一九八三年六月，是李耘生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章蕴填了《如梦令》词，悼念烈士：

回首雨花台畔，

别语匆匆遗愿。

五十易春秋，

日日在肩双担。

双担，双担，

未敢白头言倦。

“未敢白头言倦”，这几个字真切而又深刻地反映了章蕴的胸怀和情操。如果说她也有缺点，那就是不服老，不顾自己已是七十七岁的高龄，还拼命地工作。陈丕显风趣地对记者说：“我向邓大姐告了她的状！”

当我把陈丕显的话告诉章蕴时，她笑笑说：“年纪大了，应该退到第二线了，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是永远不能退的。”

斯大林说过：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从章蕴和许许多多老革命家身上，我更懂得了这句话的含义。

“余丝”未尽，壮心不已

李耘生烈士在牺牲前曾留下条子，托人交给章蕴，要她设法把妹妹和儿子营救出来，把儿子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但艰难险恶的环境，在很长时间中不允许章蕴这样做。为了奔走革命，后来甚至不得不把身边的女儿，也放在她母亲处，直

到八年之后，她才打听到李耘生的妹妹和儿子的消息，他们已被李耘生的父亲卖了九亩大田，倾家荡产才救了出来，接回了老家。等组织上派人历尽艰难设法把孩子接到苏中根据地时，他已经十四岁，面如菜色，章蕴几乎已认不得他了。章蕴教育孩子一定要继承先烈的事业。

她的两个孩子虽然在少年时期都受尽苦难，失去学习的机会，后来由于勤奋学习，都获得了优异成绩，成为专门人才，现在都在四化建设的重要岗位上贡献力量。她给女儿取的名字叫“早力”，意思是女儿早日为祖国革命事业出力。章蕴对子孙的要求很严格。女儿买了一台录音机，她要看发票，是否买了走私货。孙子学习优秀被选到国外留学，章蕴又专门写信勉励他：“荷花污不染，千锤百炼成金”。女儿早力现在是航天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她说：“由于工作任务紧张，一天下来常常很累，有时想少干一些。我的小女儿说：‘你看外婆七十多岁了还在努力干，妈妈您怎么叫起累来了呢？’想到妈妈我就鞭策自己，更要使劲干了。”

退居二线，当了中央顾问委员后，放在章大姐肩上的双担，有了新的更广泛的含义。章大姐说：“一方面我要尽一份力量，当好参谋；另方面，我还要帮助年轻同志上来。”她引古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自勉，说：“我虽然已到了风烛残年，但‘余丝’未尽，壮心不已，只要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一定尽力之所能及，又顾又问，干一件是一件，决不让那点‘余丝’白白浪费掉。”

章大姐十分关心年轻同志的成长。她看到有些青年遇到一点困难、挫折就灰心丧气，认为前途渺茫，甚至动不动就闹自杀，感到担忧。记者问她：一个人怎样才能坚持革命到底呢？

章蕴沉思了一下说：“这个问题我已反复想了好久了，在大革命失败时想过，在爱人牺牲时想过，在坚持敌后斗争时想过，在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时也想过。革命事业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一个人要坚持走革命道路，也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个是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也就是说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看到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那就不会被眼前遇到的暂时困难挫折所压倒。我所以没有被大革命失败和亲人的被害所动摇，这跟我年轻时读过《社会进化论》、《共产主义 A B C》等一些进步书刊有很大关系。我看清楚，敌人虽然猖狂，但他们注定是要灭亡，革命一定要胜利。后来我读了更多马列主义的书，这种信念也就更坚定了。

“一个是要有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再好的革命真理，如果没有一批革命志士为之献身，也只能是一纸空文。鲁迅把革命的仁人志士称为民族的脊梁，说得多好。从古至今，如果没有这些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做我们的脊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能有今天吗？这就关系到一个人怎样生活才有意义的问题，也就是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问题……。”

衷心地祝愿我们革命的前辈们长寿。他们的谆谆教诲，将永远铭记在大家心里！

章蕴同志的战斗经历，读来感人肺腑，催人奋进。她用自己的革命实践，回答了很多共产党员常在思考的问题——如何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章蕴同志在战友被杀时不后退，在爱人牺牲时志更坚；在

十年内乱中身受迫害时，还不忘“为党为国家创造哪怕是点滴财富”；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全然不顾疾病折磨。她象一团火，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事，总是奋不顾身地干，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对共产主义的忠诚。

她的事迹教育我们：一个共产党员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首先必须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必须树立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坚定信念。有没有这样的理想和信念，是能不能做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

现在有的党员在遇到挫折时动摇，在金钱和物质的引诱下犯罪，就是因为没有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信念，或者过去有过，后来淡薄了、忘记了。当然这就谈不上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一个是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一个是要有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这是章蕴同志对“一个人怎样才能坚持革命到底”这一问题的回答。让我们好好地体会一下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吧，它将给我们以启示和力量！



为真理而斗争

——记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

冒 天 启

孙冶方是一位深孚众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们党的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从一九二四年初入党至今，在近六十个革命春秋里，经历了无数艰辛和曲折，遭受到无数的打击和磨难，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忠诚于党的事业，特别是在遭受种种打击的逆境时，还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方向，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多少阵疾风，多少次冷雨，没有能够摧垮这一株参天大树；而今，在灿烂的阳光下，我们看到在它身上结满了累累硕果。

是的，人民没有忘记他，党没有忘记他。党中央开会讨论五年计划的时候，陈云同志特别提到了孙冶方的观点，胡耀邦同志也很重视孙冶方的文章。现在，他在经济理论上提出的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正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实际应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一)

这里，我们不能不先谈谈他一些遥远的往事。

孙治方原名薛萼果，一九〇八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一九二五年，他在无锡县立第一小学上学时，地下党员张效良老师在学校经常宣传爱国反帝思想。他回忆说：“这位老师简直成了我崇拜的偶像。”在这位老师的影响下，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十五岁的孙治方经董亦湘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曾经担任过中共无锡县第一任支部书记。他开办工人夜校，发行油印小报，积极地在工人、学生、教师和商人中开展革命活动，至今，在无锡市档案馆里，还保留着他写的革命传单。

一九二五年冬，他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就十分注意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毕业后，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等人给中国学生讲课，他担任翻译。利用这个机会，他系统而深入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这对他后来从事经济学研究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他曾经说过：“当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学生，旧社会的坏习气给我影响不大，也谈不上什么有系统的政治思想。经过党的教育，特别是到了莫斯科学习以后，我就从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朴素的民主爱国思想以及小资产阶级的世界大同思想，发展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确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时，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社会发展规律，以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这场变革中的伟大历史使命有了明确的认识。”

当时，王明一伙把持了中共留苏学生的领导权，大搞宗派主义，常常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对不赞成他们意见的同志搞批判斗争，这激起了党员普遍反感。有一个星期天，一些反对王明一伙的同学在孙治方的宿舍里会餐吃中国菜，王明

借此捏造了“江浙同乡会”的案件，把这些同志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孙治方也被牵扯进去了。这件事尽管在一九二八年经中央专案组审查，公开否定有“江浙同乡会”组织，但是，王明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间，还是利用联共（布）清党的机会，给这些同志扣上了托派的罪名而加以排斥与打击。孙治方虽然未被打成托派，但也无端地受到了“处分”。一九三〇年九月，孙治方背着种种“嫌疑”回国了。

（二）

孙治方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没有把“冤屈”放在心上，总是说：“只要自己努力工作，不怕牺牲，是不难取得信任的！”他以高昂的热情积极工作，担任了上海人力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及人力车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每天出入人力车夫的茅草棚，甚至还拉车在马路上找工人做工作。后来，他又调任沪东区工人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正当他下厂筹备组织工会时，不幸被捕。敌人没有任何证据断定孙治方是共产党员，因此他只在捕房关押了七天就被保释。但是，他和党组织的关系，骤然中断了。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孙治方怀着对党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积极地开展工作。他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总会有一天用事实向党证明：我是忠心的！”

当时，托派在理论战线上大肆污蔑党的土地革命正确路线。他们以神州国光社为据点，出版书籍、杂志，公开散布说：中国是国际财政资本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王明一伙在党内也

推行“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上，夸大资本主义比重，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针对这些情况，孙治方挺身而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进行社会调查，用理论和实际材料驳斥托派的谬论。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之后，曾到进步学者陈翰笙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后来又参加了陈翰笙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了《中国农村》月刊。他认真地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华北、华中、华南各地农村，都留下了孙治方的足迹。他用活生生的事实材料论证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有力地驳斥了托派那种“左”得出奇的谬论。尤其是他写的《财政资本的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文，对严灵峰等人所散布的托派谬论，有论有据，逐条批驳，这是一篇在理论斗争中很有影响的文章。孙治方还克服各种阻挠，想尽一切办法调查了上海沪西纱厂包身工制度的情况，写成了《上海纺织厂中的包身制工人》一文，发表在《华年》杂志上，文中用大量的证据说明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封建剥削。

一九三七年，党恢复了同孙治方的关系，他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文委书记，参与领导了上海文化战线的对敌斗争。

四十年代初期，孙治方调至华中局党校当教员兼任教育科长。当时，一些学员以“大老粗”为荣，鄙视理论学习。孙治方了解到这种对于理论的偏见代表着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就写信给刘少奇请教这个问题，刘少奇当天即给他写了近三千字的回信，对他的意见做了肯定的答复，并详细地阐述了革命理论对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这就是有名的《答宋亮同志》（当时孙治方党内用名是宋亮）。